

老年

美國人素來重視年輕人甚於年齡和經驗。 老年人不應該有風光的時刻嗎？

撰文：Frank Bures

一次注意到這一點，當時他正在賴比瑞亞做實地考察。「在我研究過的村子裡，你會看到更多的小孩幫年長的人跑腿，例如帶食物、帶工具，」他告訴我。「孩子們任他們使喚：『去拿這個！去拿那個！』社區裡的任何成年人，在村裡，都有權告訴孩子該怎麼做。這似乎與美國當代的兒童撫養大不相同。在我們的社會裡，我們很少把我們的需求加諸兒童身上。」

「在我們的社會裡，」他總結道，「兒童統治。」

藍西回到美國後開始閱讀以世界其他文化為重點的人種學手稿。在研究了1,000多個社會之後，他意識到他在賴比瑞亞村莊看到的是常態，美國文化是個例外。他發現，在大多數地方，孩子甚至都不被認為是完整的人。相反，成人資格是要你去贏來的。「貫穿這些社會的一條共同線索是，孩子們一開始的期望很少，而且重要性也很小，」他說。

如果我們的文化可以被描述為兒童統治體制，那麼他發現在世界各地更為普遍的安排就是他所謂的「老人統治體制」：一個以老人為最有價值的成員的社會。「在一個老人體制中，光是令人尊敬的年齡就賦予你地位，」藍西說。「最重要的是，好的工作、勤奮工作、照顧他人，諸如此類的事情都可以提高你的社會地位。兒童沒有任何這樣的經驗。被認為重要的是兒童

不久前，我們當地報紙刊了一篇讀者投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美國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撰寫本文時超過52.5萬人）無法與美國歷次參戰的死亡人數相比：韓戰36,574人；越戰58,220人；第二次世界大戰405,399人；內戰498,332人。

原因是，他寫道，戰爭殺死了年輕人。另一方面，新冠肺炎正在殺害老人。

「士兵的平均死亡年齡，」這位70多歲的投書人認為，「保守地估計25歲，如果他們的平均壽命是——同樣，保守地——75歲，每個死亡都代表著損失50年的壽命。」最常見的新冠肺炎死亡年齡是70歲以上，即使預期壽命為85歲，那是15年或更短的壽命損失。

「死亡就是死亡，」他總結道，但即便如此，我們不能拿一個25歲的年輕人與一個75歲的老人相比。

我們許多人都有這種感覺：年輕人的死亡比老人的死亡更悲慘。在這個計算中，生命的價值取決於尚未活的年數，而不是擁有多少生活經驗。這一評估假設潛在的生命比實際生命更有價值。

如果我們照著這個邏輯，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相信生命的過程必然帶來生命的衰敗，而且我們每天的價值都比前一天低，直到最後，我們發現自己沒有任何價值。

人類學家、《撫養孩子：來自其他文化的驚人見解》(Raising Children: Surprising Insights from Other Cultures)一書的作者大衛·藍西(David Lancy)發現這種心態在美國很普遍，他為這種心態創造了一個術語：「兒童體制」，意思是以兒童為中心的社會體制。兒童被認為是社會最有價值的成員。

藍西在20世紀60年代第

Frank Bures 是《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長期撰稿人，也是《瘋狂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Madness)的作者。



繪圖：Brett

對他人的貢獻，以及他們如何為整個社區做出貢獻，而不是他們自己獨立完成的成就。從許多方面來說，老年統治體制更符合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進化。」

我們美國如何成為這樣？我們是如何到達我們崇拜兒童和蔑視老年人的地步？根據藍西的說法，到上世紀中葉，父母開始以他們的孩子為重心，並且這種趨勢在以後的

數十年都在上揚。同時，出生率在下降，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每個兒童的價值都在增加。兒童也消耗了越來越多的家庭資源。

然而，美國人對青少年的熱愛有比這更深的根源。歷史學家說，在 19 世紀後期，衰老的過程被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醫學問題。阿什頓·艾普懷特 (Ashton Applewhite) 在她的著作《這把椅子搖動：反對

年齡歧視的宣言》(This Chair Rocks: A Manifesto Against Ageism) 中指出，這一趨勢在 20 世紀加速了。「在戰後休閒和繁榮的推動下，消費文化的爆炸式發展，以及對剛被用『青少年期』來形容的生活階段的研究，青少年文化成為二十世紀一個獨特的現象，」她寫道。「隨著這種『青少年崇拜』的成長，老年恐懼症——對衰老的恐懼和對老年人的厭惡，甚至仇恨——開始流行起來。」

在整個 20 世紀，老年人的地位下降，今天老年人們發現自己處於階梯的最底層。如果幸運的話，我們都是未來的老年人，但我們常常懷著恐懼和拒絕承認來看待未來。2019 年，美國人在抗衰老產品上花費了 530 億美元，這些產品號稱能阻止這種自然過程，或者至少其外表。

然而，在兒童統治體制的代價中，也許最能道出真相的是，對於此次疫情不成比例地奪走我們的老年人的生命，我們反應冷漠。

想像一下，新冠肺炎剛流行時奪走了 80% 的受感染兒童的生命。照理會發生恐慌的。照理會有憤怒的。照理會有行動和更重大的嘗試來控制病毒，正如中國大陸、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比較不以年輕人為中心的文化。我們照理會採取極端措施保護我們最寶貴的公民。

但是我們沒有。現在，

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和越戰的幾代人也上了這場抗新冠肺炎戰爭的前線。

吉姆·普佩 (Jim Puppe) 知道，老年不但不是陷入長期沒落，而且生活歷練，以及歷經艱困，可以增進生命的價值。他在北達科他州長大，聽過關於大蕭條、黑色風暴「骯髒的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社會面臨的其他挑戰的故事。然而，他回憶道，經歷過這些艱難時期的人似乎並不痛苦。他們似乎並不生氣。相反，他們似乎感到滿足。事實上，他們經歷的逆境越多，他們就更滿足。

普佩想知道為什麼。因此，在退休之後，他於 2004 年著手在自己所在州的每個社區中去找一個可以分享智慧的人。他會到一個城鎮，向周圍的人詢問這裡有無有「人文精神、樂觀、道德高上、價值觀和正直」的人，他想要訪談。

很多時候，這是一個年紀大，經歷過艱難時期的人。普佩會和他們坐下來，聽他們怎麼說。每次訪談結束時，他都會問這個人對孫子們有什麼建議。「他們會說發揮愛心、尊重別人、誠實，」而我打電

話給他時，他告訴我。「但一個在那裡只坐了一分鐘的傢伙說，『我沒有建議給他們。』」

於是我說，『您對孫子們沒有任何建議嗎？』

他說，『沒有。我如何生存就是我的建議。』」

14 年來，普佩訪問了 617 個城鎮，並在一本名為《達科他態度》(Dakota Attitude) 的書中發表了他收集的故事。「他們告訴我的實在是無價之寶，」他說。「我們可以從這些未獲運用的人那裡獲得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在我看來，我們今天世界遇到的大多數問題都可以讓一個好奶奶來解決。」

如果這次疫情有什麼好處的話，我希望我們當中有更多的人最終會像吉姆·普佩那樣，而不像我當地的投書人。我希望我們能看到，隨著年齡的增長，生命變得越來越有價值，而不是更無價值。如果我們的文化不會從兒童為中心的方式改變，那麼讓我們每個人在我們認識的人中間建立我們自己的小型老年統治體制——在一切智慧、一切記憶和一切生命消失之前。

「有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尚未獲得運用。我們今天世界遇到的大多數問題都可以讓一個好奶奶來解決。」

